

學人牧者的理想與學術研究 在神學教育上的角色

郭鴻標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一 引言

為甚麼華人神學教育界在此時此地要探討「學人牧者」這個課題呢？筆者嘗試把從事神學教育中的所見所聞作一個時代反省。本文的作用是拋磚引玉，希望引發諸位同道的回應和分享。

筆者於1995年在德國修讀神學博士課程期間，內心有一個願望，就是成為「敬虔的學者與牧者」，這亦是筆者回港後投身神學教育之餘，參與教會牧養的原因。筆者於按牧後，更加覺得神學教育機構不單致力培訓技術工人，而且致力栽培「忠於基督誠於學術的牧人學者」，使他們懂得根據整本舊新約聖經正典進行神學思考，承傳歷代教會信仰，在全球化及華人文化處境下尋找時代信息，回應時代的挑戰，牧養人的心靈。因此，本文不單客觀地討論「牧人學者」這個課題，更表達了筆者個人的神學教育理想。

筆者認為「牧人學者」(pastor theologian) 與「學人牧者」(theologian pastor) 有不同的定義。前者是指具備牧者情懷和身分的學者，他們可能曾經全時間牧養教會，現時卻主要在神學院從事教育工作。後者則指具備學者修養的牧者，他們曾經在其他學科獲得博士學位，或者具備神學或哲學博士學位，又或者擁有教牧學博士學位。個人認為神學教育機構應該同樣重視培訓這兩類人才。「牧人學者」是神學院的老師，他們豐富的牧養經驗加上學術的反省能力可以成為學生的榜樣，幫助同學按部就班地踏上「學人牧者」或「牧人學者」的道路。

本文集中討論神學教育機構如何傳遞栽培「學人牧者」（即具備學者修養的牧者）投身學術研究的異象。本文會從四方面討論這課題：（一）教會歷史中傑出的「學人牧者」；（二）為甚麼華人教會需要「學人牧者」？（三）這個時代需要教會神學和公共神學並重的「學人牧者」；（四）二十一世紀華人「學人牧者」需要重視的神學課題。

二 教會歷史中傑出的「學人牧者」

當筆者閱讀一本獻給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前院長吉萊斯皮 (Thomas W. Gillespie) 的著作的時候，初次接觸到「牧人學者」的觀念。¹ 吉萊斯皮蒙召進入普林斯頓神學院受訓，期間深受亨德里 (George S. Hendry)、派珀 (Otto A. Piper) 及萊曼 (Paul L. Lehmann) 等人的影響。亨德里精於巴特德語原著，尊重聖經權威，肯定理性的作用，重視屬靈上的委身；派珀專精新約聖經原典研究；萊曼敢於挑戰基督教倫理輕視羣體建立的洞見，刺激更深的神學反省。透過這些敬虔學者與牧者的薰陶，吉萊斯

¹ Wallace M. Alston Jr. ed., *Theology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Essays in Honor of Thomas W. Gillespi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0), x.

皮被塑造成為日後得力的堂會牧者和植堂先鋒。² 吉萊斯皮兼具牧者的情懷、學者的深思，在講道的服侍上顯出與眾不同的特質。於1983至1998年間，吉萊斯皮擔任普林斯頓神學院院長，繼續推動訓練「牧人學者」的遠象。³

當思考「學人牧者」或「牧人學者」這個課題的時候，筆者首先會問：在教會歷史中有沒有先例呢？按筆者理解，在教會歷史中，奧古斯丁是牧者、神學家，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及加爾文 (John Calvin) 既是「學人牧者」，又是「牧人學者」。奧古斯丁承繼使徒保羅在聖經中的教訓，深入刻畫人的罪性，這種神學上的罪觀使路德及加爾文重新發現因信稱義的教義真理有關鍵性的影響。至於路德及加爾文對教會的貢獻，實在是跨世紀甚至劃時代的。他們是優秀的「學人牧者」或「牧人學者」，他們把從聖經中領受的亮光整理成扭轉時代的神學思想，以推動宗教改革，確立基督新教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教會歷史上的屬靈偉人是與眾不同的，是上帝特殊的揀選。究竟這些跨世紀及劃時代的屬靈偉人如何進行神學思考、如何實踐信仰、如何推動異象？他們的經驗對華人神學教育有甚麼啟迪？本文不會全面討論路德及加爾文的生平和神學，而只會集中交代他們如何就信仰及教會事奉經驗作更深刻的神學思考，然後認定教會更深改革的方向，並且鮮明地傳遞上帝給他們的時代信息。

筆者選擇研究路德的專家羅西 (Bernhard Lohse) 的神學歷史進路，沿着路德著作的寫作年代，勾畫路德神學思想發展的軌跡，從而理構

² Alston Jr., *Theology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Essays in Honor of Thomas W. Gillespie*, 4.

³ Alston Jr., *Theology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Essays in Honor of Thomas W. Gillespie*, 6.

出一幅思想發展歷程的圖畫。⁴ 路德教授詩篇時期（1513-1515），對人性的罪有更深刻的體驗。詩篇五十三篇3節說：「……並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⁵ 詩篇三十二篇2節上：「……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上帝不計算 (*imputat*) 人的罪；相反，卻把正義算進去 (*reputat*)。上帝是有恩惠憐憫的上帝（參詩一一〇4）。路德開始擺脫奧克漢姆 (William Ochkam) 樂觀的人觀，重新重視詩篇中上帝赦免的教訓。⁶ 詩篇二十五篇11節：「耶和華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為我的罪重大。」⁷ 路德教授保羅書信時期（1515-1518；1515-1516年講授羅馬書，1516-1517年講授加拉太書，1517-1518年講授希伯來書），發現救恩在個人以外 (*extra se*) 發生。因此，他對於奧克漢姆和比爾 (Gabriel Biel) 等認為人天生有自由意志行善的觀點十分抗拒。他傾向救恩在我們以外 (*extra nos*) 發生，同樣，公義亦不是在人內裏的生命完成，而是外加的 (*aliena iustitia, extranea iustitia*)。⁸ 路德放棄經院哲學的恩典觀，例如恩典累積成內在的生命素質或內涵 (*habitus*)，使人活出德行及恩典不同的形態 (*form*)，例如影響性恩典使人決志，然後是另一種恩典幫助人的靈命成長。路德強調上帝恩典獨立於人以外運作，不需要人作為最終的根據。經院哲學認為上帝的恩典透過教會的洗禮、聖餐、告誡，將超自然的元素加進人的靈魂。當人透過這種超自然恩典與基督聯合，人內在生命就產生新的容量，活出有品格的人生。⁹ 路德認為人需要的回應是真心相信，而不是例行地參與聖禮。路德的神學反

⁴ Bernhard Lohse, *Luthers Theologi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5), 17.

⁵ Lohse, *Luthers Theologie*, 73.

⁶ Lohse, *Luthers Theologie*, 67.

⁷ Lohse, *Luthers Theologie*, 68.

⁸ Lohse, *Luthers Theologie*, 81.

⁹ Bernard M. G. Reardon, *Religious Thought in the Reformation* (London: Longman, 1981), 51.

省，促使他對基督信仰有更深刻的認識，更清楚教會應該宣講甚麼信息，以及應該如何更新改革。路德的神學反省，讓他了解教會牧者的身分和使命。對路德來說，牧者的召命是正確地宣講聖道及施行聖禮。路德從教授聖經書卷引發更深層的神學思考，對當時教會藉發售贖罪券來籌款修建教堂的做法深表不滿，同時透過神學思考分析教會的問題及提出改善的建議。終於引發1517年張貼95條改革建議在威登堡教堂門外的事件，觸發宗教改革運動。

第二代宗教改革者加爾文亦是典型的「學人牧者」。¹⁰ 加爾文是「教師與牧者」(teacher and pastor)，又是「神學家」(theologian)。他不單熟悉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也熟悉古代經典哲學，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塞尼卡 (Seneca)、西塞羅 (Cicero) 等人的思想。¹¹ 加爾文透過對神學的反省撰寫要理問答和講章，塑造信徒的虔誠生命。¹² 他承繼路德因信稱義的神學，卻開發對信徒生活成聖的討論，使稱義與成聖得到更平衡的處理。對路德來說，只要他緊記自己是蒙恩的罪人，他內心就得到安慰。因此，他否定修道生活及靈命成長階梯。路德雖然同意蒙恩的罪人透過日常的禱告可以經歷聖靈的更新及內住，但是他卻沒有開發這方面的討論。由於路德的神學研究主要與爭議性事件連在一起，因此他對當時並非主要爭議的課題，鮮有詳細討論，例如1530年他助手

¹⁰ 參Randall C. Zachman, *John Calvin as Teacher, Pastor and Theologian: The Shape of His Writing and Thought*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s, 2006). Williston Walker, *John Calvin: Revolutionary, Theologian, Pastor*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 2005). William Wright 指出，Randall Zachman並不像Partee、Dowey、Parker循神學方法的進路了解加爾文；而是從《基督教要義》教育結構及目的論述加爾文作為教師、牧者和神學家。參William A. Wright, "Review on *John Calvin as Teacher, Pastor and Theologian* by Randall C. Zachman,"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89 (2007) 1, 178。

¹¹ Mary Coleman, "Review on *John Calvin as Teacher, Pastor and Theologian* by Randall C. Zachman," *Review on Religion & Theology* 14 (2007): 2, 241.

¹² John Kelsay, "Review on *John Calvin as Teacher, Pastor and Theologian* by Randall C. Zachman," *Church History* 76 (2007): 2, 410.

墨蘭頓與天主教訂定奧斯堡信條，就沒有在三一論方面出現分歧。雖然路德沒有直接參與制定奧斯堡信條，但是墨蘭頓是在他支持下完成制定信條的工作。相比加爾文，路德在三一論更形沈默，加爾文作為第二代宗教改革者，在神學建構方面，他把路德的思想發展得更完整。近年靈修神學的討論都追溯敬拜 (Doxology) 三一神與屬靈生命改變的關係，加爾文的三一論成為重要思想資源。另外，科學與神學的討論亦追溯加爾文的神學知識論。因此，加爾文神學對後世的神學思考有深遠的影響。

綜觀路德及加爾文兩位宗教改革者，他們對信仰生活、教會事工及神學理據的反省，產生跨世紀及劃時代的影響。對於華人神學界，我們應該思考如何提供一個平台讓這樣的人才成長，我們應該如何培訓影響華人教會未來的「學人牧者」呢？筆者在簡單介紹兩位宗教改革者後，特別選取十九世紀德國牧者神學家作例子，主要原因是筆者對德國的神學家較為熟悉。當然北美洲的清教徒傳統也有傑出的牧者神學家，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 便是典型的「學人牧者」，¹³ 可是，由於篇幅所限，筆者主要選擇德國的例子。

筆者相信，對於華人牧者來說，圖爾奈森 (Eduard Thurneysen) 是一個陌生的名字。然而，圖爾奈森是影響巴特 (Karl Barth) 神學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人物。圖爾奈森與巴特於1913至1920年間在鄰近的牧區工作，兩人經常討論講章的題目和信息，並且設計聖經及神學研習課題，同時合作出版講道集。¹⁴ 圖爾奈森以教會牧養為主要任務，不單將眼光放在完成一樁接一樁的事工；並且就教會牧養所面對的問題，追溯其聖經及神學的根源，作出徹底而全面的反省。¹⁵ 圖爾奈森的神學是以教會

¹³ 〈<http://www.christianhistorystore.com/ch77edwards.html>〉 (accessed 3 Jan. 2009).

¹⁴ James D. Smart, "Eduard Thurneysen: Pastor-Theologian," *Theology Today* 16 (1959) 1, 77.

¹⁵ Smart, "Eduard Thurneysen: Pastor-Theologian," 1, 74.

為處境，思考人在世界生活所面對的信仰與神學問題。圖爾奈森的神學可說是教會神學，而他是一位「學人牧者」。

對於接受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神學訓練的牧者來說，神學是非常學術的學問，聖經的記載都需要按當代科學的眼光來解釋，因此，基督信仰中超自然部分無形中漸漸縮減。基督教神學的獨特性正在於超越的上帝轉變為歷史耶穌的偉大人格。既然耶穌基督的神性難以獲得確定，就只好把焦點放在耶穌偉大無私的愛之上，喚起世人的道德良知。這樣的神學取向把基督教神學的獨特性約化為道德，在西方基督教傳統及文化為主的地方，還可以訴諸基督教傳統及文化，維持人的基督徒身分。不過，這種文化基督教在面對現實人生問題的時候就顯得軟弱無力。圖爾奈森強調神學是教會神學，而不單是文化神學，主要因為他對於教會牧職的認真和重視。他選擇以堂會牧師服侍為主，以兼任神學院講道學教授為副，展示了一個「學人牧者」的例子。他的神學理念不單塑造了自己的教會牧養路線，也影響了一代神學大師巴特。

巴特從事神學研究，亦首先根據教會牧養的經驗開始，探索更深層的神學問題。當他在教會牧養期間，面對基層人士生活艱難的處境，他思考過往接受的自由主義神學，如何成為人面對現實生活艱難困境的屬靈幫助。巴特發現，如果神的道不是真實的話，他真的不知如何宣講。若按照自由主義神學把聖經肢解，否定非科學的記載，基督信仰將遭貶值為一些道德教訓而已。當巴特認真發展他的神學的時候，就開展出《教會教義學》。對他來說，神學是教會一種功能，¹⁶ 神學則可以分類為聖經神學、教義神學及應用神學。聖經神學探討基督信仰根據的問題，教義神學探討在教會宣講的教義問題，應用神學探討教會牧養的問

¹⁶ Karl Barth, *Die Kirchliche Dogmatik Band 1: Die Lehre vom Worte Gottes. Prolegomena zur kirchlichen Dogmatik*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1986), 1.

題。¹⁷ 巴特強調根據上帝的道檢查教會的宣講，筆者把這個理念擴展，根據上帝的道檢查教會的所有活動和功能。巴特的神學立根於上帝自我啟示，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建立起一套《教會教義學》。無論贊成或反對巴特神學的人都會同意，巴特有自己一套的完整神學思想，有清楚的理論根據和突破。巴特神學在自由神學思潮下扭轉思考方向，確實是獨特的一家之言，對於今日教會趨向事工化、追求人數增加及迎合非信徒為主的潮流，確實是一種沈厚有力的神學提醒。

另一位在納粹德國時代堅持認信的牧者神學家是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他的神學關懷一直都是以教會的本質和召命為核心，探討教會在人類社會及具體歷史環境中的角色。¹⁸ 潘霍華在其博士論文〈聖徒相通〉 ("*Sanctorum Communio*") 中，確立教會的社會性神學 (Theology of Sociality)。¹⁹ 潘霍華的教會神學並不局限於基督教教義本身，而是從教會作為在基督裏的實體與上帝對人類社羣重建的心意，發展他的神學。潘霍華在1928年到西班牙巴塞隆那牧養教會，開始落實他的教會神學。他於1930年教授資格論文 "Act and Being" 中探討人與他者的關係，發展一種「他者的社會性」 (sociality of other)。²⁰ 基於這種神學信念，潘霍華投身阻止納粹德國操控教會並踐踏人類的行動。潘霍華參與持守耶穌基督信仰為中心的神學教育，訓練認信教會的牧者。潘霍華強調門徒的代價，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呼召人不要把這種恩

¹⁷ Barth, *Die Kirchliche Dogmatik Band 1*, 3.

¹⁸ Geoffrey B. Kelly and F. Burton Nelson, *The Cost of Moral Leadership. The Spirituality of Dietrich Bonhoeffer*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3), 8. 另參〈<http://justus.anglican.org/resources/bio/133.html>〉, 〈<http://www.satucket.com/lectionary/DBonhoeffer.htm>〉 (accessed 10 Mar. 2009).

¹⁹ Dietrich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A Theological Study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Church*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6), 1.

²⁰ Dietrich Bonhoeffer, *Act and Being.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and Ontology in Systematic Theolog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6), 11.

典視為廉價恩典。筆者認為潘霍華這方面的提醒，對今日的信徒仍然起着教導作用。在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中，我們對羣體的需要變成把自己的意願延伸。我們選取符合自己喜好的羣體，這種心態嚴重影響我們的教會生活。潘霍華強調負責任的自由，教會不是獨裁的組織，而是上帝的家。人在教會中需要負責任地運用個人的自由，實現上帝對教會的心意。

三 為甚麼華人教會需要「學人牧者」？

筆者認為，路德對牧者職事的描述十分正確，牧者應該正確地宣講聖道和施行聖禮。筆者認同「學人牧者」的理想，因為這樣的牧者能夠有效地運用聖經回應時代需要。因此，「學人牧者」應要有效地宣講及帶領教會回應時代挑戰。以事工及技術訓練為主的神學訓練已經不少，甚至聖經學院亦紛紛易名為神學院。究竟聖經學院與神學院有甚麼分別呢？簡單來說，聖經學院主要提供舊新約聖經書卷解釋 (exegesis) 課程訓練，加上基本的教義、教會歷史及一些應用科目，培訓牧者。聖經學院式的訓練是實用為主，聖經書卷解釋亦以理解經文內容作講道和教導，建立教會及宣教為重。由聖經學院變為神學院，基本上是為了提升學術地位，增設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課程。至於教學理想及理念則沒有顯著的分別。眾多華人神學院已經能夠開設神學碩士 (Master of Theology)、教牧學博士 (Doctor of Ministry) 甚至哲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課程，這是劃時代的突破，而華人神學研究的水平亦不斷提升。感謝神！然而，筆者須指出，在引用聖經經文作講道和教導方面，神學詮釋仍然未獲得正確的重視。舉一個例子，「從聖經看……」這類引用聖經經文作講道和教導的活動，基本上涉及聖經解釋 (biblical exegesis) 及神學詮釋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很多時候，神學院的同工仍然採用聖經學院的思維方式，以為解釋聖經後，就可以自動找到回應時代的適切信息。誠然，「從聖經看……」的解經，可

以針對個人的心靈需要，對於個人屬靈生命更新十分有幫助。可是，這種「個人化」的解經進路很容易變成「私人化」(privatized)。當然這類「個人化」的解經往往可以建立起一個非常內聚的信仰羣體——教會，但缺點是無法回應社會和文化課題。當社會變得複雜，弟兄姊妹的需要由屬靈上的聖經知識擴展到心理健康、性格問題、人際關係和婚姻等範疇的時候，牧者很容易認為接受一些神學訓練以外的輔導訓練，將會對教會牧養有更實際幫助。當牧者努力補救弟兄姊妹生命中的破損的時候，關心職場信仰實踐的弟兄姊妹就認為教會的講道和教導過於「由上而下」(top-down)，把基督徒的價值觀硬套進複雜的現實社會。在急速變化的社會下，牧者需要尋找適切的信息回應職場的複雜情況外，弟兄姊妹的信仰還受到很多社會及世界事件所衝擊。這些信仰衝擊，不是增加一些教會活動便可以解決的。倘若要有效面對這種挑戰，牧者必須付上時間、努力思考這些問題，按照聖經真理宣講及教導。筆者認為加強牧者講道能力，不僅涉及改善溝通表達的技巧，也關乎增加對聖經內容及不同文體特色的認識，和建立一種合符神學詮釋原則，又配合個人風格的詮釋方法，好讓牧者有效地傳遞時代的信息。筆者認為，「學人牧者」需要懂得運用解釋聖經的知識，作為回應時代的神學詮釋。

綜觀教會歷史中「學人牧者」的例子，他們除了具備美好的屬靈生命外，更能夠從神學角度思考時代思潮問題，並且在教會的處境下進行神學建構，幫助教會更新，使教會的宣講更能夠回應時代的需要。神學訓練除了技術層面外，還應該重視培訓「學人牧者」，使教會活潑地宣講聖道，並且從深度的神學反省，找到批判時代思潮及重建現代人類文化的聖經信息。

牧者蒙召傳遞上帝的道，需要珍惜聖經及神學的學習，藉着禱告將人帶到上帝面前。牧者要當心別讓全副精力埋葬在行政事務上。牧者是屬靈領袖，不是事工項目經理或統籌，這些組織及事務工作可以由具備行政恩賜的非牧職人員來承擔。牧者需要安靜自己的心，分析教會的方向是否符合上帝的心意。牧者需要在繁忙的事務中看出上帝工作的軌

跡，不然只是每年周而復始機械式運作。牧者應該珍惜屬靈生命的更新與重整，需要在繁忙的教會事務中，尋找心靈空間，反思事奉的方向和焦點，同時需要懂得從聖經及神學角度分析教會事工路向。神學工作者的任務是按照神的道審查教會的宣講及事工，使教會行在神的旨意中，我們可稱他們為「有牧者情懷的學者」(pastor theologian)，為教會審時度世及探問前路。同樣，牧者亦可以像神學工作者，對教會事工進行批判思考，他們不單是教會事工的技術人員，更是「具神學反省力的牧者」(theologian pastor)。神學思考與教會牧養的整合，應該是神學工作者與牧者共同追求的理想。

「學人牧者」應該是渴慕成為有道可傳的人，每個經歷神生命改變的基督徒都希望將福音傳給親人朋友。我們內心有一種負擔，讓更多的人認識神。我們珍惜閱讀聖經及屬靈書籍的機會，我們喜歡聽道，熱心服侍教會。當我們要負責帶領查經班的時候，感覺自己對聖經一知半解，渴望接受培訓。有些弟兄姊妹蒙神呼召，全時間事奉祂。這些弟兄姊妹在領袖及羣眾的鼓勵下，踏上講壇事奉。感謝神讓他們在事奉中成長，可是在缺乏完整神學訓練之下負起講道職責，究竟如何避免瞎子領路的危險呢？筆者鼓勵負起講道職責的弟兄姊妹，謙卑接受完整的神學訓練。若已經完成系統化神學訓練，亦應該努力求進步，以應付中國教會及社會急速的變化，成為有道可傳的人，亦懂得如何宣講落實於現實人生的「道」。講道並不等於解經，亦不等於見證分享。講道並不是按主觀感受來分享經文，亦不是對經文作學術研討；講道是傳道人從神領受信息，針對會眾的屬靈需要「按時分糧」。講道的風格因人而異，有人認為只要按聖靈感動，不必預先撰寫講章。亦有人覺得沒有預先撰寫講章是輕忽講道的職事。筆者習慣預先撰寫講章，同時覺得釋經講道對弟兄姊妹能產生更實質的幫助。筆者沒有教授講道學的經驗，以下只是一些個人經驗分享。筆者認為，講道其實是一種聖經神學與時代文化互動的詮釋，講道的服侍乃是神學思考反省活動的結果。牧者需要辨別神的心意，按時分糧。講道者需要讓神的道「道成肉身」，回應時代思

潮、社會文化議題對弟兄姊妹信仰的衝擊，以適切的聖經信息，透過神學上的整理，堅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因此，講道可以具備宣教、護教、鼓勵等功能。牧者應該努力擴闊知識面，用諸般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向人解釋。

解釋經文是往後回溯，尋找經文在原來處境的意思。這個原來處境可以分三個層次：首先是該段經文所反映的歷史處境，或稱「文本視域」(textual horizon)，第二是經文寫作時的歷史處境，或稱「時代視域」(epochal horizon)，第三是經文在聖經作為教會正典為教會整體信徒所了解的歷史處境，或稱「正典視域」(canonical horizon)。²¹ 筆者認為，聖經學者往往能夠幫助我們明白前兩個歷史處境，卻較少從聖經作為教會正典這角度來解釋經文。從聖經作為教會正典這角度解釋經文，涉及兩方面的知識：第一方面是聖經神學的知識，第二方面是教義神學的知識。聖經神學着重從某個或幾個神學主題把舊新約聖經的主題貫串起來。當然，不同的聖經神學對聖經正典主題有不同的觀點。筆者認為，縱使當代聖經研究經文的文本語言及修辭研究比聖經神學更受重視，聖經學者還會就聖經神學作研究和論述。但是，一些牧者對神學詮釋學會十分陌生，原因之一是後現代哲學詮釋學可以抽離聖經，運用哲學概念解構經文，甚至肢解聖經。筆者認為，除了注解經文外，任何經文的解釋，自然會觸及運用不同觀念和例子表達主題信息。我們不要以為引用經文加上例子就等於講道，因過程中涉及神學詮釋的問題。筆者認為，「學人牧者」應該清楚自己採用甚麼神學詮釋學和根據，筆者在本文無法詳細討論神學詮釋學的問題，可是，由於這課題較少為從聖經學院轉型的神學院所注意，故此，筆者就稍作交代。牧者預備講章的時候，運用神學詮釋學就聖經文本建構一個神學骨架 (theological

²¹ Richard Lints, *The Fabric of Theology. A Prolegomenon to Evangel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3), 293.

framework)，作為回應時代思潮的講道內涵。筆者認為，「學人牧者」應該根據其聖經知識（包括對文本的了解和聖經神學），把經文與基本教義互相印證，產生一個講道的神學骨架，然後從這個講道的神學骨架引伸出對應現今處境的神學遠象 (theological visions)。²² 范胡撒 (Kevin Vanhoozer) 提出每節經文都有四個焦點：命題 (propositional)、目的 (purpose)、出現形式 (presence) 與能力 (power)。在着重經文的多樣性與豐富含意下，聖經象徵提供神子民世界觀的重要材料。聖經象徵不單是歷史事件，同時能夠改變人的思想模式。²³ 穆勒 (Richard Muller) 認為神學詮釋的模式包括聖經、歷史、系統、實踐四方面。²⁴

「學人牧者」應該懂得從聖經通過歷代教會歷史知識的長廊，進入教義及系統神學的領域，經過思想上的激蕩和提煉，引伸出實踐的屬靈指引。「學人牧者」不單要對聖經、基督教歷史、教義神學及應用神學有良好基礎，同時要了解中國文化哲學，熟習中國基督教歷史，明白神在當代中國社會變化中的作為，洞悉當代中國人心靈的需要，培養敏銳的時代觸覺，投身教會的牧養，認識弟兄姊妹生命上的掙扎和得勝經歷，從而把堅實的聖經研究、神學反思，與現實生活融合，使「道成肉身」。這是傳道人畢生努力學習的方向。

當然接受磨煉成為有「道」可傳的傳道人，並非一時三刻的事。基本上，接受系統神學訓練，強化閱讀原文聖經的能力，掌握歷代神學思想發展，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工夫。「學人牧者」應該抱着為上帝國度和教會讀書研究之目的，用經過檢查反省的神學理念指導教會牧養。在現代專業主義的分化意識籠罩下，神學研究與教會牧養被視為兩個完全

²² Lints, *The Fabric of Theology*, 292.

²³ Lints, *The Fabric of Theology*, 297.

²⁴ Richard A. Muller, *The Study of Theology: From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to Contemporary Formulat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1), 171.

不同的領域。神學工作者給定位為在神學院的圖書館鑽研學問，發表學術論文；牧者就被視為在堂會處理實務。本來各按其職互相分工是十分合理的，可是，我們需要批判普遍把神學工作者界定為只重理論不重實踐，而將牧者塑造成為務實卻不必注重抽象思維的觀念。作為神學教育工作者，我們需要洞悉今日教牧身分的危機，及早提出警告，讓教會避免受長遠虧損。在現時教會的生態環境，牧者主要的任務往往是充任教會的事務經理，統籌組織教會活動，努力安排一項又一項活動，滿足弟兄姊妹的需要。有時，牧者甚至外判一些事工給機構，例如青少年野外歷奇、佈道訓練等。有些教會甚至覺得負責青少年牧養的同工，需要有社工的訓練比神學訓練更重要。一些教會有龐大的同工團隊，一般剛畢業的傳道鮮有在「大堂」擔任講道職事，令他們需要更長時間去建立牧者形象。在教會尋求更新模式的時候，我們需要小心警醒，思考牧者的角色是否被縮減為行政人員。當教會集中以行政策略推動人數增加的時候，牧者的身分危機就是遠離祈禱、傳道及牧養人心靈的呼召。作為神學教育工作者，我們應該協助神學生及教牧同工重尋牧者的神聖召命。牧者的主要任務是講道、教導及擔任屬靈導師，牧者的屬靈領導是由聖經及神學作主導的。牧者不單需要熟練的技術，如處理婚禮、喪禮，更需要掌握婚禮、喪禮的神學意義，明白神設立婚姻的目的，以及生命和死亡的意義。在急功近利的文化氛圍下，需時長久的技術磨煉遠遠不及按照「成功教會」的樣板行事那麼快捷有效，遑論由技術的層面提升至理論層面的反思。當牧者努力在工作表現上尋求獲得認可，就只能藉行政手段取得職位賦予的權力 (positional authority)，卻未必有從神領受的屬靈權柄 (spiritual authority)。時代牧人需要有從神而來、活潑的時代信息，忠心的牧者得需先在內心為神所抓牢。沒有內在本我 (being) 的更新，怎能有產生影響力的宣講，更何來改變人生命的行動 (doing)。

筆者認為，「學人牧者」不單關注個別教會事工項目的運作方法，更重要是懂得從神學角度來思考教會的本質和功能，例如宣教、崇拜與聖樂、基督教教育、靈命建立、輔導、講道、牧職與教會增長。若

神學訓練只着重技巧和方法，很容易局限在「術」的層面。「學人牧者」需要追求神學上的整合，反思教會的講道、教導、敬拜、團契、事工模式、活動的神學基礎是由「道」指導「術」。「學人牧者」不一定是某方面的專家，但應該追求神學科系內部的整合，由聖經引伸歷史、神學、倫理作指導思考，建構適切時代的教會論。「學人牧者」本着神在末世時代對教會的心意，建構他的教會神學和牧會理念，例如教會是甚麼？牧者的任務是甚麼？「學人牧者」有甚麼獨特的地方？

「學人牧者」對教會有甚麼獨特的貢獻？他們不僅提供屬靈活動服務，而是作「有道可傳」的傳道人。神學教育不單灌輸資料，而是建立人，這包括學術研究、靈命更新、品格建立，和作出回應時代的宣講，建構適切時代需要的事工理念。學人不單是專才，同時是通才，懂得在神學科目中間作科際整合，又懂得把神學科與非神學科進行科際整合。「學人牧者」可以專攻教牧學研究，亦可以專攻學術科目研究。牧者從事學術研究是為教會而進行，忠於教會信仰，卻批判地檢視教會的宣講、事工理念、事工模式。另一方面，「學人牧者」可以從事學術研究，例如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研究、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與基督教的關係、西方基督教神學與哲學等課題，目的是尋求真理，見證真理。

四 這個時代需要教會神學和公共神學並重的「學人牧者」

「學人牧者」除了作教會神學的學術研究外，亦需要開展公共神學的研究。究竟教會是否應該在世俗的社會中要求所有人接受基督教價值觀呢？如果社會上有人認為世俗社會應該有一套不受任何宗教信仰主導的「公共理性」，基督徒便不應把宗教道德強加諸其他人身上。究竟教會應該如何建構公共神學呢？筆者認為，基督教學術包括教會神學和公共神學，神學上的學術研究也包括教會神學和公共神學。教會神學主

要對應教會內部的需要；公共神學則對應教會回應社會及文化的議題，例如同性性行為、工作倫理、貧窮、全球化的問題……

筆者引用潘能伯格 (Wolfhart Pannenberg) 及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 作為教會神學和公共神學並重的「學人牧者」的例子，指出二十一世紀華人教會需要這類牧者。

潘能伯格的《系統神學》巧妙地把教會神學和公共神學結合起來。在關於上帝觀部分，潘能伯格把三一上帝放置在世界多元宗教處境討論，回應宗教多元化的挑戰。潘能伯格本身並非研究世界宗教，但是他正確地提出問題，如果基督教的上帝並非創造天地的上帝，那麼基督徒的宗教經驗只不過是他們對信仰的詮釋，而不是普遍有效的真理。潘能伯格深信基督信仰是普遍有效的真理，所以他不願意把信仰經驗解釋為某些主觀心理經驗。他要建構基督信仰的客觀真實性。他這樣處理三一論，並非要把神學與宗教研究結合起來，而是敢於面對世界多元宗教處境的事實，不將上帝約化為只是對教會羣體有意義的「神學術語」(theological terminology)。²⁵ 潘能伯格循神學和教義的角度探討人觀及罪觀的問題，²⁶與早期關於神學人觀的著作有不同的重點。²⁷ 潘能伯格在教會論方面亦引進德國信義會與羅馬天主教對話成果，使《系統神學》關於教會論的討論更具時代意義。²⁸ 潘能伯格的神學具備跨科際特色，他參與神學與宗教學、神學與社會科學，及神學與科學的對話，令

²⁵ 參Wolfhart Pannenberg,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Band I*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8).

²⁶ 參Wolfhart Pannenberg,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Band II*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1).

²⁷ 參Wolfhart Pannenberg, *Anthropologie in theologischer Perspektiv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3).

²⁸ 參Wolfhart Pannenberg,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Band III*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3).

學術界重視神學的貢獻。筆者認為，二十一世紀華人教會需要將神學帶進學術領域，讓非基督徒能夠思考神學與各種學科的關係。筆者認為，跨文化研究重視帶職宣教召命，故此，二十一世紀華人教會亦需要推動在大學任教的弟兄姊妹尋找信仰與學術的整合，更有效地承擔基督徒的召命。

至於莫特曼早期的神學着重耶穌基督的復活²⁹與十架受苦，³⁰及聖靈在教會的工作，³¹是相當有代表性的教會神學。莫特曼早期的著作集中在三一論方面，並關注三一上帝與上帝的國、³²三一上帝與創造、³³三一上帝與歷史等課題，³⁴以及上帝的創造與宇宙更新的關係、³⁵³⁶聖靈論、³⁷基督教與猶太教的關係，並且從彌賽亞角度了解耶穌基督，³⁸和關於基督教與中國宗教，特別是智慧與道的關係等課題。³⁹莫特曼建立一種具備跨科際向度的教會神學，從神學角度回應生態與環境保護的

²⁹ 參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64)。

³⁰ 參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Das Kreuz Christi als Grund und Kritik christlicher Theologie*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72)。

³¹ 參Jürgen Moltmann, *Kirche in der Kraft desGeistes*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75, 1989)。

³² 參Jürgen Moltmann, *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 Zur Gotteslehre*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80)。

³³ 參Jürgen Moltmann, *Gott in der Schöpfung*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86)。

³⁴ 參Jürgen Moltmann, *In der Geschichte des dreieinigen Gottes – Beiträge zur trinitarischen Theologie*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91)。

³⁵ 參Jürgen Moltmann, *Das Kommen Gottes. Christliche Eschatologie*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95)。

³⁶ 參Moltmann, *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 Zur Gotteslehre*。

³⁷ 參Jürgen Moltmann, *Die Quelle des Lebens: der Heilige Geist und die Theologie des Lebens*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97)。

³⁸ 參Jürgen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Christologie in messianischen Dimensionen*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80)。

³⁹ 參莫特曼著，曾念粵譯：《科學與智慧》（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2）。

課題，發展一種基督教公共神學。

華人教會需要參考歷代「學人牧者」的經驗，思考中國處境的神學發展路向。近年漢語神學強調學術意涵，貶低教會意涵；高舉「理性」過於「信心」。⁴⁰ 甚至把奧古斯丁的「恩典神學」解釋為只要有上帝恩典，就不需要人的信心。⁴¹ 這種觀點明顯地與以弗所書二章8、9節的教導不同：「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筆者同意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同樣可以按照追尋宇宙真理的渴望，來思考神學課題，卻不同意把「信心」的客觀對象——上帝——轉變成以人為主體。⁴² 此外，筆者並不同意把亞奎那的神學歸類為「以知求信」，⁴³ 亦不同意把啟示神學視為普遍啟示的補充。⁴⁴ 亞奎那認為人的生存是有目的——指向上帝。上帝為了人得救的緣故，將超越人理性的知識向人啟示。上帝聖道的啟示修正人理性對上帝的探索。⁴⁵ 上帝聖道的啟示其實是高於理性探索而得的知識，而不是反過來補充普遍啟示。按照亞奎那的思路，哲學用理性，神學用信仰。當理性停止的時候，信仰就開始。換句話說，當哲學停止的時候，神學就開始。這就是亞奎那所指哲學是神學的先導 (*Philosophia praeambula Theologiae*) 的意思。當理性的哲學得出上帝存在的結論，神學就開始解說這位上帝是誰。因此，理性的哲學為了信仰的神學服務，這就是「哲學是神學的婢女」(*Philosophia est Ancillans Theologiae*) 這名句的原意。所以，研究上帝聖道啟示之學問——神學，

⁴⁰ 黃保羅：《漢語學術神學：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頁9。

⁴¹ 黃保羅：《漢語學術神學》，頁28。

⁴² 黃保羅：《漢語學術神學》，頁29。

⁴³ 黃保羅：《漢語學術神學》，頁33。

⁴⁴ 黃保羅：《漢語學術神學》，頁48。

⁴⁵ 聖多瑪斯·亞奎那：《神學大全》第1冊（台南：碧岳書社，2008），頁3。

是所有學問的歸結，這些對亞奎那神學的基本常識，實在難以支持把亞奎那的神學歸類為「以知求信」的論點。⁴⁶

筆者認為，大學的神學研究不應只重學術而忽略教會和信仰向度，所以並不同意漢語神學高舉理性學術為標準，輕視教會的建議。⁴⁷ 如果漢語神學繼續貶低教會和信仰的重要，⁴⁸ 則神學院應該加強學術研究，向大學的學術界展示教會信仰是合理和科學的。若一般大學沒有基督教神學專業，只是在宗教學、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專業下研究基督教，重點是宗教學和人文學意涵而非神學意涵，⁴⁹ 那麼基督教神學的神學意涵必然受約化。在這種情況下，神學院必須努力證明基督教神學的教會意涵與信仰意涵，不會妨礙其學術性發展。如果大學的學術神學有別於教會傳統的漢語神學，⁵⁰ 那麼神學教育界便需要正視這方面的挑戰，建立一種重視基督信仰和教會的漢語神學。

五 二十一世紀華人「學人牧者」需要重視的神學課題

筆者認為，二十一世紀華人「學人牧者」應該加強公共神學的建構工夫。公共神學的向度包括科學與神學、社會倫理、文化神學、宗教哲學、漢語神學等課題。「學人牧者」需要忠於基督信仰，在人文學界以優秀研究成果見證上帝。「學人牧者」應該不受地域的限制，牧養基督教學術研究團隊，建立華人基督徒學者團契，向華人學者傳福音。

⁴⁶ 鄒昆如：〈介紹周克勤神父所譯聖多瑪斯《神學大全》〉，《神學大全介紹》（台南：碧岳書社，2008），頁13。

⁴⁷ 黃保羅：《漢語學術神學》，頁37。

⁴⁸ 黃保羅：《漢語學術神學》，頁40。

⁴⁹ 黃保羅：《漢語學術神學》，頁67。

⁵⁰ 黃保羅：《漢語學術神學》，頁75。

筆者認為，神學院應該強調神學與其他科系的整合，在神學訓練中加強社會文化的向度。公共神學首要的任務是探討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的相互關係。福音派對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的立場大致有三類，第一類是以傳福音為主軸；第二類是以史托德為首，主張傳福音與社會公義並重，但仍以傳福音優先；第三類是傳福音與追求社會公義都是宣教一部分，代表人是賽德 (Ron Sider)、帕迪拉 (Rene Padilla)、埃斯科巴 (Samuel Escobar)。作為神學教育工作者，應該明白文化更新或社會改革不能促進天國實現人間，然而，這並不表示基督徒與教會不必關心文化更新或社會改革的課題。從神學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從基督為中心及救贖論出發，結合創造論處理「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 的課題。因為始祖已經犯罪墮落，人類整體活在墮落的人性與文化中，因此不能脫離耶穌基督的救贖談文化更新。「救贖文化」的理想亦只可能有限地實現在人間。⁵¹ 筆者認為，凱珀 (Abraham Kuyper) 強調基督是文化之主，並且在公共領域實踐見證基督的使命，實在值得佩服。不過，凱珀把重點放在人類文化基督化，忽視傳福音的使命，這難以徹底地改變人心。⁵² 縱使教會傳福音效果極佳，以至社會大部分人歸信，我們仍然要問，這是否可以達致文化基督化的結果。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提出社會不等於人總和，縱使社會上每個人都是有道德的人，並不表示社會可以變得有道德。原因是社會有制度，制度性的惡不能從個人道德層面獲致解決，我們需要在社會及制度層面來處理。⁵³ 筆者同意文化使命是文化宣教的一種，⁵⁴ 基督徒不應從文化、政治、社會道德等領域退下來，相反

⁵¹ 吳獻章：〈文化更新？（上）——失樂園後的失焦與聚焦〉，《舉目》第26期（2007年5月），頁23。

⁵² 吳獻章：〈文化更新？（下）——失樂園後的失焦與聚焦〉，《舉目》第27期（2007年9月），頁27。

⁵³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 Politic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1).

⁵⁴ 陳宗清：〈從文化使命到文化宣教〉，《舉目》第26期（2007年5月），頁20。

需要尋求共通語言向非基督徒社會傳達基督徒的價值觀。⁵⁵ 作為牧者，亦需要具備公共神學的訓練，以回應社會及文化的課題。

（一）科學與神學

由於中國學生學者深受科學主義的影響，總覺得基督信仰不合乎科學要求，因此，神學與科學的研究在中國處境是重要的神學課題。究竟「學人牧者」可以如何回應中國學術界的挑戰呢？筆者認為，神學院必須發展高等學術研究並且培養教牧同工成為「學人牧者」，其中一個重要範圍是基督教神學與科學的研究。牧者需要從宣教的角度與當代學術思潮對話交流。普蘭丁格 (Alvin Plantinga) 的改革宗神學知識論⁵⁶ 與鄧勃斯基 (William A. Dembski) 的智慧設計論⁵⁷，均屬學術界接受的論說。儘管有學者持反對的意見，但最低限度他們已經在學術界的平台進行溝通對話的工作。雖然很多研究基督教的學者未必能夠容易放下唯物主義、科學主義的觀點，然而，部分基督徒哲學家的著作已給翻譯成中文。其中有宗教哲學方面⁵⁸，亦有科學方面⁵⁹，藉此也引進宗教思想。

智慧設計論是一種肯定宇宙有智慧設計者的科學理論，它並非一種護教學，卻蘊含基督教及一神宗教的神觀。筆者敬佩基督徒科學家對信仰與學科整合的抱負。在深受進化論影響的學術界中，他們堅持宇宙由神設計的信念，十分難得。作為神學工作者，筆者認為，當代神學研

⁵⁵ 熊璩：〈文化使命與雙職事奉〉，《舉目》第9期（2003年3月），頁18。

⁵⁶ 阿爾文·普蘭丁格著，邢滔滔等譯：《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⁵⁷ 鄧勃斯基著，盧風譯：《智慧設計論》（香港：天道書樓，2004）。

⁵⁸ 參凱利·詹姆斯·克拉克著，唐安譯：《重近真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普蘭丁格：《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

⁵⁹ 蘭西·佩爾斯、查理士·撒士頓：《科學的靈魂》（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究需要強調「科學神學」(scientific theology)的議題。既然上帝是創造者，我們探索大自然規律的時候，應該可以窺見上帝工作的痕跡。作為承繼宗教改革者路德的更正教神學研究者，我們高舉十架神學，但也需要正面了解上帝在大自然創造所表彰的榮美。根頓 (Colin Gunton) 建議從三一上帝觀出發思考創造，然後開展一種對自然的神學理解 (theology of Nature)。⁶⁰ 麥格拉 (Alister McGrath) 嘗試在強調啟示的同時，努力發展一種更正教式的「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⁶¹ 麥格拉參照加爾文兩種關於上帝的知識 (*duplex cognitio Dei*)，界定「上帝乃創造主」(God as Creator) 及「上帝乃救贖主」(God as Redeemer)，⁶² 強調加爾文的神學注重神與人在世界的關係。麥格拉指出，巴爾塔薩 (Hans Urs von Balthasar) 及愛德華滋均重視大自然的美，⁶³ 並從真善美三方面探討科學神學，⁶⁴ 值得鼓勵。

(二) 倫理學與神學

作為華人基督徒，我們更應該重視中國社會處境下的倫理反省，透過討論社會倫理的議題，分享基督信仰和價值觀，我們應該珍惜參與基督教倫理學的研究機會。倫理學課題可以分三大類：(1) 性倫理，例如同性戀、同性婚姻；(2) 生命倫理，例如墮胎、自殺、安樂死、生育、器官移植、幹細胞研究、基因工程、動物權利……；(3) 社會倫理，例如工作、商業、經濟、貧窮與全球化、戰爭、政制、人權等。

⁶⁰ Colin E. Gunton, *The Triune Creator. A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Stud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8), 145.

⁶¹ Alister E. McGrath, *A Scientific Theology*, vol. I, *Natur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1), 295.

⁶² McGrath, *A Scientific Theology*, vol. I, *Nature*, 275.

⁶³ Alister E. McGrath, *Science &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136.

⁶⁴ McGrath, *A Scientific Theology*, vol. III, *Theory* (London: T&T Clark, 2003).

筆者認為，「學人牧者」應該開展職場神學研究，了解弟兄姊妹在職場上面對信仰與現實的掙扎，重新思考基督徒倫理的問題。究竟基督徒倫理應該是黑白分明，還是有很多灰色地帶呢？基督徒職場倫理着重處境的獨特性，那麼如何與原則保持平衡呢？究竟甚麼是基督徒職場倫理的原則呢？或者把問題往深推進一步，究竟基督徒職場倫理有沒有原則呢？還是基督徒職場倫理應該放棄命題式進路，採取故事的角度解釋聖經文本呢？究竟基督徒職場倫理如何找到合理的道德推理，也同時找到建立人德行的途徑？⁶⁵ 世界在全球化發展下，經濟以知識型主導。資訊科技突破性的發展及網絡功能的提升，增加人獲得資訊的速度，而工作的模式亦超越地域的限制。⁶⁶ 在這樣的全球網路關係下，過往本土化與國際化的對立縮減。例如源自美國的次按風暴可以導致全球金融海嘯，雖然中國經濟體系因着尚未完成開放，受到即時衝擊程度較一些歐美國家為低，但是中國政府不能閉關自守完成「保八」的理想，必須留心國際金融的走勢，評估對中國出口的打擊，然後按階段推出救市方案，刺激內需。在全球化趨勢下，中國要超英趕美，便不能只停留在本土化的路線上，而必須踏足國際舞台。中國申辦2008奧運，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派軍艦保護商船，在在顯示出中國掌握提高本土素質及融入國際的平衡力。

（三）宗教、文化研究與神學

上列例子對神學教育亦有所提示。筆者認為，二十一世紀的時代工人投身教會的事奉，需要具備全球視野。「學人牧者」需要懂得中國

⁶⁵ 參郭鴻標：〈基督教工作神學對社會和諧貢獻〉，《建道學刊》第29期（2008年1月），頁109~140。另參卓小平、許志偉編：《基督宗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頁154~181。

⁶⁶ 湯馬斯·佛里曼著，楊振富、潘勳譯：《世界是平的》（台北：雅言文化，2005），頁55。

民間宗教的知識，以及明白中國開放改革三十年來在社會、政治、經濟、宗教政策等方面的變化。因此，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漢學研究、中國近代基督教歷史研究、中國哲學研究、當代中國教會情況研究、中國神學研究等對二十一世紀的牧者十分重要。

「學人牧者」需要懂得世界宗教研究的方法與發展，嘗試在世界多元宗教處境下解釋基督教的獨特性。當社會把基督教視為與一般宗教無異，在人類歷史文化進程中基於環境及文化因素形成某種世界觀的時候，「學人牧者」如何解釋基督教與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在於神親自的啟示？二十一世紀「學人牧者」需要強化宗教研究的知識，面對多元主義宗教神學，清楚有力地陳述堅持耶穌基督是唯一拯救希望的信仰。筆者發現很多學者誤解巴特的宗教立場，總是把他歸類為排他主義。其實，巴特不單批判人類宗教，同時批判基督教。對他來說，「信仰」(*Glaube*)與「宗教」(*Religion*)是不同的：「宗教」是人在歷史中尋找上帝的表現；「信仰」是指上帝親自向人啟示自己並且激發人產生敬畏。因此，「上帝的啟示乃是對宗教的揚棄」(*Gottes Offenbarung als Aufhebung der Religion*)這話，強調在歷史中的基督教可以淪為「宗教」，為上帝所放棄。若基督教要成為真的宗教，必須承認上帝在耶穌基督裏，透過聖靈在教會賞賜給信徒恩典。⁶⁷

按筆者了解，中國學者對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較注重亞奎那及啟蒙運動研究，故此，「學人牧者」應該加強這些領域的研究，強調從基督信仰角度演繹亞奎那的神學。筆者發現，不少中國學者將亞奎那視為哲學家，忽視亞奎那本身信仰基督與作為神學家的身分。⁶⁸此外，「學

⁶⁷ Karl Barth, *Die kirchliche Dogmatik. Band 4. Die Lehre vom Worte Gottes. Prolegomena zur kirchlichen Dogmatik*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1993), 377.

⁶⁸ 參郭鴻標："Thomas Aquinas's Virtue Ethics and the Implication for Sino-Theological Ethics", 《建道學刊》第27期(2007年1月), 頁117~136。另參郭鴻標：〈托馬斯·阿奎那的德性倫理學及其對漢語倫理學的啟示〉, 許志偉編：《基督教思想評論》(北京：世紀出版集團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頁97~110。

人牧者」應該加強啟蒙運動前後哲學及神學思想的研究。筆者發現，不少中國學者可以分辨法國啟蒙運動傾向革命思想，英國啟蒙運動傾向自然神論，把上帝棄置於宇宙自然規律以外，德國啟蒙運動傾向保持理性與啟示吊詭 (paradox) 的平衡。然而，中國學者較少注意近代西方神學家如何面對啟蒙運動高舉理性，輕視上帝啟示的方法。因此，「學人牧者」可以在這些學術課題上分享研究成果，促進互相交流，見證基督。⁶⁹

(四) 漢語神學

現時中國學術界出現一批對基督教研究有興趣的學者，他們大部分並非基督徒。究竟從事神學教育的「學人牧者」應該如何回應這個現象呢？筆者抱着既喜亦憂的態度：一方面這些沒有宗教信仰的學者，站在同情基督教的角度為基督教講公道的說話，對基督教來說，這十分有利。可是，在另一方面，非基督徒學者極可能按照個人喜好，選擇性接受基督教神學思想，結果所詮釋的基督教可以與歷代教會所認信的信仰有嚴重的差異。在當前中國處境下，漢語神學是一門十分熱門的項目。不少學者對基督教神學思想史研究發生興趣。這包括對奧古斯丁、亞他拿修、亞奎那、路德、加爾文，甚至當代歐洲德國、英國神學家和當代亞洲神學家的研究。中國學者重視漢語神學是值得欣慰的事。從學術自由角度來看，中國學者認為研究神學不必受基督信仰所局限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亦可理解他們傾向在教會以外進行客觀學術研究的想法。故此，筆者認為，「學人牧者」應該在尊重中國學者那種放開基督信仰及擺脫教會來建構漢語神學方法的大前提下，清楚解釋神學研究與

⁶⁹ 參郭鴻標："Schleiermacher on Piety"，《建道學刊》第27期（2007年1月），頁137~167。

基督信仰的關係，以及神學研究與教會的關係。⁷⁰ 當然，漢語神學與聖經研究的關係不容忽視，「學人牧者」應該珍惜機會，與中國學者進行對話及交流，讓中國學者理解漢語神學可以具備更大兼容性，尊重基督徒演繹基督教神學的權利。非基督徒可以參與基督教神學的研究，但是不能輕視基督信仰或者教會，更不應該妄顧基督教二千年神學傳統，斷言教會神學不是學術神學。

五 總結

筆者認為，神學訓練本身可以多元化，例如着重某項事工的技術，亦可以着重牧養方法，亦可以強調整合的訓練，亦可以強調「學人牧者」的訓練。每種神學訓練都有價值和服侍對象，各自對神的國度都有重要貢獻。然而，香港眾神學院有過百位具備博士學位的教師，再加上世界各地華人神學院及牧者，我們需要問上帝，這樣的條件，到底為了完成上帝甚麼心意呢？筆者認為，神學院強化「學人牧者」的訓練，並非追求時尚，而是善用上帝所賜的資源，為上帝培訓二十一世紀時代的工人。願以此互勉，阿們。

⁷⁰ 參郭鴻標：〈對「漢語神學」的神學反思〉，《建道學刊》第26期（2006年7月），頁169~191。另參郭鴻標：〈對何光滙教授的「漢語神學的根據與意義」及「漢語神學的方法與進路」兩文章的回應〉，《漢語神學芻議》（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149~165。另參Benedict Hung-biu Kwok: "A Response to He Guanghu's 'The Basis and Significance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d 'The Methodology of and Approaches to Sino-Christian Theology'," in Huilin Yang & Daniel H. N. Yeung eds.,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 Press, 2006), 133-149。

撮 要

上帝是真理知識的源頭，亦是宇宙的創造者。上帝的子民被呼召在不同崗位上見證上帝；牧者被呼召裝備信徒發展恩賜，在不同領域事奉上帝。在二十一世紀，牧者除了懂得推動教會事工活動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懂得幫助弟兄姊妹從基督信仰角度詮釋生活經驗。這種服侍是一種在時代潮流文化中進行神學反思的活動。牧者有不同恩賜，筆者集中討論「學人牧者」的課題，文章從四方面入手：第一方面，教會歷史中傑出的「學人牧者」；第二方面，為甚麼華人教會需要「學人牧者」？第三方面，這個時代需要教會神學和公共神學並重的「學人牧者」；第四方面，二十一世紀華人「學人牧者」需要重視的神學課題。筆者提出當代神學教育應該加強公共神學的向度，幫助牧者從基督信仰角度回應世界的挑戰。

ABSTRACT

God is the origin of knowledge and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The people of God is being called to witness Him in their positions and the pastors are being called to equire the sisters and brothers to develop their gifts in order to serve God in different areas. In the 21st century, pastors should know not only the technique of running church activities, but also how to interpret the life experience from Christian perspective. This kind of ministry is to reflect theology in the current cultural context. Pastors have different gifts and this writer focus in the topic of "Scholar Pastor."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irstly, the outstanding "Scholar Pastor" in church history. Secondly, why the Chinese churches need "Scholar Pastor"? Thirdly, the church theology and public theology should get equal emphasis in this generation. Fourthly, what kind of theological issues the Chinese "Scholar Pastor" need to address? This writer points out that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is generation should put more emphasis in the public theology in order to help the pastors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world.